

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策略导向、路径选择与具体实践

李桂花, 梁秋实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长春 130012)

摘要: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既要有策略导向, 如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推进普及绿色发展方式、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也要有路径选择, 如明确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力量、调整农村产业发展布局、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投入; 还要有具体实践, 如提升农民主体意识、推动基础设施完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只有把这三者有机结合起来, 新时代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才会迈上一个新台阶, 取得更加明显的实效。

关键词: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策略导向; 路径选择; 具体实践; 美丽乡村

中图分类号: X3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1971(2025)04-0116-07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1]25} 这是党中央在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2]26} 基础上对“加快建设农业强国”^{[1]25} 的进一步强调。其中, 扎实推动生态振兴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25} 的重要方面, 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提高都极为关键。因此, 要扎实推动生态振兴, 就必须治理农村生态环境, 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 既要有策略导向、路径选择, 也要有具体实践, 下面结合习近平的相关论述加以分析。

一、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策略导向

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策略导向是指在全国范围内都起作用的理念和所要遵循的原则, 而不是仅仅适用于广大农村地区, 因为良好的生态环境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前提, 也是经济社会发

展的基础。因此, 只有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 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推进普及绿色发展方式, 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才能有效治理包括农村在内的生态环境。

(一) 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发展态势, 在“富起来”的同时, 也“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7}, 然而部分地区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换言之, 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十分巨大, 但生态文明建设依旧是短板, 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发展。习近平指出:“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3]4}。这就告诉我们必须统筹兼顾生态环境保护和生产力发展。为此, 要想破解我国生态环境治理难题, 就要利用新质生产力为生态环境治理注入动力。

新质生产力相比于传统生产力实现了质的跨越。其中, 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对于科技创新成

收稿日期: 2025-03-14

基金项目: 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乡村振兴进程中吉林省农村生态治理问题研究”(2020A19); 吉林大学研究生院项目“大思政课下‘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改革与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研究”(2024JGY052)

作者简介: 李桂花(1965—), 女, 吉林辽源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哲学博士, 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研究; 梁秋实(1995—), 女, 吉林大安人, 博士研究生, 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

果的应用。新质生产力因注入科技要素,在保证绿色发展的同时,可以实现生产产能、效率、韧性等方面的可持续提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创新生产工具的使用,如数字化机器的投入以及大规模的机械化生产,使数字产业告别了以往的传统作业,不仅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还降低了劳动强度;二是促进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的同步提升,智能化精准技术可以按照实际需求来科学使用资源,能够做到定时定点定量完成任务,优化资源配置,提升资源利用率,同时解放活劳动,大大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劳动力需求;三是应对极端气候冲击、确保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利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对生态环境实现更加精准的管控,同时数字产业与智能产业的发展可以减少对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碳排放量。

可见,加速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实现新时代生态环境治理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必由之路。习近平强调科技创新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两山”理论则指出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并行不悖。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以绿色发展为底色,依靠科技创新,既保证生产效率和品质提升,又守住生态环境红线。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形成生态产业注入新动力,能更有效地利用新要素加强生态环境治理,进而完善绿色发展链条。

(二)推进普及绿色发展方式

在传统发展方式下,高投入、高消耗往往会导致资源开发过度、生态环境破坏严重,而绿色发展方式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体现出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关系。绿色发展方式是对传统资本逻辑的反思与超越,主张将生态价值纳入生产目标,强调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通过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以及推进产业生态化,就可以摆脱“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的良好循环。

中国当下面临的生态环境困境,主要在于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与环境污染严重,尤其在农业领域最为突出。那么,“如何在资源环境硬约束下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和质量安全、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能力”^[4]便成为必须应对的一个挑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践行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一重要发展理念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原则”^{[5]361}。绿水青山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母

亲赐予的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更是能给我们带来金山银山的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因而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41}。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绿色发展方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

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态环境治理是内在统一的。绿色发展方式通过优化生产模式减少环境压力,促进生态环境改善;而生态环境治理则为绿色发展方式的实施创造条件。在政策引导、技术创新和全民参与的共同努力下,可以实现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三)构建新型生产关系

为支撑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生产关系应该进行与之相适应的变革。治理生态环境不仅是生产力保护和发展的需求,也是生产关系调整的需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协调发展,需要改变不合理的生产关系,使全体人民成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直接受益者。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不仅是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也是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更是构建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新型关系。

首先,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新型关系。自然是人类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的,也是人的无机身体。人与自然之间不应该是人一味地向自然索取,而应该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习近平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2]165}

其次,构建人与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必须处理好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注重绿色发展的公平性,防止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以及资本的逐利性导致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生态危机的频繁发生。人与人之间新型关系的构建,需要限制资本对生态环境的掠夺性开发,强调生态优先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将生态环境保护置于生产关系的核心地位。习近平提出,生态环境保护要与共同富裕结合起来,避免生态治理和绿色转型中弱势群体受到不公正对待,确保生态红利惠及全体人民。

最后,构建人与生产资料之间的新型关系。人与生产资料之间不应该再延续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生产模式,而应通过制度设计约束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开发,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3]8},推动人与生产资料之间新型关系的构建。

总之,新型生产关系的构建,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相结合的重要体现。这不仅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塑,也是对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全面保障。

二、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

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选择是指适用于农业农村农民即“三农”问题中的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一些发展路径和实践指向,也就是要明确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由谁引领、靠谁执行以及如何执行等。

(一)明确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力量

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必须首先明确治理活动的发起者、治理过程的参与者。根据习近平关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2]17}以及“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2]42}的重要论述,需要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等主体力量协同发力^{[6]120-127}。

首先,党的领导至关重要。在我国,“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1]53},也即“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17}。这就要求必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各方面各环节,把党中央的顶层设计、部署安排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在贯彻党中央指示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具体要求并向下级党组织部署任务,从而使党的方针政策能够落地生根。而作为基层的农村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则是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力军和生力军,不仅要发挥自身的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还要带领村民脚踏实地地完成各项目标任务,为建设美丽乡村发光发热。

其次,政府的主导必不可少。党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领导作用主要是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而政府部门作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者,不仅要承担相应的治理责任,还要协调各部门的治理实施工作。应该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全面深化,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就是更好地明确了其权力边界、提出了更为合理的治理举措、采用了更加科学的治理方式、取得了更为突出的治理效果,也就是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主导作用。当然必须指出的是,各级政府部门还要再接再厉、攻坚克难,在自觉推进自

身治理体系改革的同时,积极为其他主体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便利和条件,以形成多元协同的治理共同体。

再次,企业的作用更加凸显。企业特别是一些坐落在农村或城乡接合部的乡镇企业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必须发挥其主体作用。虽然它们确实承担起了中间环节的责任,但是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未见根本性好转,也与其过分注重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环境效益分不开。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整改力度,使其积极采用先进环保型技术,进行无害化生产,不仅要实现自身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还要为所在地区生态环境治理贡献力量。

又次,社会组织的参与越发必要。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也需要社会组织的参与。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社会组织特别是环保组织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会越来越突出,因而要充分调动其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其心甘情愿地参与到治理中去。这就要求相关部门做好沟通、服务和保障工作,既要让其出资出力,也要让其建言献策,进而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力。因此,必须加强社会组织的参与作用,才能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广泛的社会支持。

最后,农民的作用非常关键。农民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必须有所作为,而且是能够大有作为的,因为新时代农村的主体依然是农民。农民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坚力量。所以,只有农民的大力支持、自觉参与、主动作为,才会使党和国家的各项环保政策落到实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才能真正取得实效,农民也才能最终受益。

可见,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主体力量中,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农民的作用虽然不同,但目标却是共同的,都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

(二)调整农村产业发展布局

农村产业发展布局是否合理、优化,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尤为重要。改革开放前,在我国农村产业布局中,主要是第一产业比重过高,从业人口也最多,那时的农民基本上都被束缚于土地,在给定面积的农田里进行农业生产,虽然在客观上增加了农作物的产出,但因人多地少,再加上还有不同程度的旱涝等自然灾害,实际上农民的收入水平有时不但没有提高反而会下降。

改革开放后,为了落实党和国家让一部分地

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方针政策,也为了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有限的土地上解放出来,就需要根据各地农村的实际情况来发展非农产业,于是在我国一些地方先后出现了影响较大且为其他地区农村所效仿与借鉴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三角模式等。虽然这些模式因村因地各有特点,也都推动了当时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总体说来,它们都是围绕发展第二产业来进行的,也就是农村的工业化发展。尽管这些地区非农业发展的优势都很明显,但其弊端也不少,特别是在农村生态环境方面。换言之,在农村发展第二产业,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有些地方确实产生了一些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始料未及的;同时,经过几十年的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在农村地区产业发展布局中,不少地方因第二产业比重过高和第三产业发展不足,再加上大多又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的所谓发展,使其最终陷入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不能同时兼顾的悖论之中。所以,要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改善,就必须调整和优化农村产业发展布局。

当然,调整农村产业发展布局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具体情况,努力做到按照现代农业体系来打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高效安全的第一产业,持续推进结构优化并使农村工业和农业产业化相结合的第二产业,积极发展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第三产业,并最终实现“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27}。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转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确立绿色发展方式,进而走出一条农村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业生态良好的乡村振兴之路。

可见,调整农村产业发展布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从源头上、根源上来整治农村生态环境,是新时代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路径,因而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三)加大农业科技创新成果投入

科技创新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是提升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率最大化的主要手段。高质量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农业中将显著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有害物质排放。习近平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因而要以技术创新推动绿色发展,改变传统高污染、高消耗的农村生产方式,进而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推动科技成果在农村的应用,必须将农民的利益

放在首位,保证科技创新能够切实地提升农民的生产生活水平,改善农村生态环境,才能确保美丽乡村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如此一来,科技创新成果是否能够精准投入,以及如何保证科技创新成果投入将直接影响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效果。

政府和企业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投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时,应明确分工、协同攻关。政府的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可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到农村生态技术研发和应用中,协调所有制结构与科技资源的配置,可以减少农村传统的小农经济难以承担科技投入的风险。企业的科技创新投入需要通过制度设计协调资本逻辑与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避免有违社会公平正义等情况的出现,以实现科技创新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高效应用,从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的有机结合。

当然,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的科技创新投入,不是为了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是为了实现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和共同富裕的双赢。在落实科技成果投入时,只有实现生态红利的共享,让广大农民成为科技红利的直接受益者,才能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真正实现,才能推动乡村经济、社会与生态系统的永续发展。

三、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

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是指适用于广大农村地区生态环境治理的一些具体办法和措施。习近平关于这方面的论述比较多,且针对性强,具有可操作性。下面主要从提升农民主体意识、推动基础设施完善和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一)提升农民主体意识

农民作为农村各项事务的主要参与者、直接受益者,必须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主体作用。提升农民主体意识不仅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转变观念,还要通过政策引导,让他们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真正发挥积极性和创新性。

一是加强生态教育,提升农民的生态意识。首先,要进行生态培训和宣传,举办生态保护相关讲座。地方村镇要通过各种媒介向农民普及生态保护的基本知识和理念,通过典型案例使农民切实感受到农村生态环境破坏带来的最直接影响以及成功治理后所带来的红利。其次,提高农民参与的组织化程度。通过合作社、村民自治组织、生

态治理协会等形式,将分散的农户凝聚起来,共同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可以推行生态农业示范村建设,展示绿色生产方式带来的好处,激发农民学习和参与的热情。最后,让农民参与制定村庄的生态治理计划,听取他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看法和建议,使其感受到自己是治理的主人,而非被动执行者。当然,涉及项目决策过程,也可以进行公开讨论和协商,以增加农民的责任感和认同感。

二是建立利益激励机制,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农民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参与的积极性往往与切身利益相关。因此,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确保农民在生态环境治理中获得直接的经济回报,有助于提升他们的主体意识。首先,实施生态补偿机制,对于因生态治理而限制生产活动(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的农户,政府应提供合理的生态补偿,确保他们的收入不受损失。通过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弥补农民因生态环境治理而产生的短期经济损失,激励其积极参与。其次,发展生态经济,提供新收入来源。通过发展生态农业、绿色产业、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让农民看到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长期收益。

三是推广生态友好型生产技术,增强农民的治理能力。政府和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可以通过免费培训、技术支持等方式,帮助农民掌握有机农业、生态种植、低碳农业等技术,让他们能够在生态环境治理的同时实现农业生产效益的提升。比如,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生物防治技术,减少对化学品的依赖等。此外,建立技术服务平台,通过在线农业技术平台、生态环境治理咨询来向农民提供便捷的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这样一来,农民就可以随时随地获得生态环境治理的最新技术和政策动态,提升其治理能力。

可见,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从农民自身入手是关键。提升农民的治理主体意识,不仅需要从思想上培养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观念,还要通过组织引导、政策支持、技术提升等方式,增强他们的自主治理能力和参与动力。通过生态教育、利益激励、技术推广等手段,可以让农民认识到生态环境治理对个人、集体和农村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从而主动参与。

(二)推动基础设施完善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题中之义。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在影响农村美的诸多因

素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农村基础设施老化、落后,这也是导致城乡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基础设施老化,即现有的一些基础设施年久失修,严重影响其功能的正常发挥,如水、电、路、气、房、讯等,该修建的修建、该完善的完善、该升级的升级;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即现有的一些基础设施已经落伍了,没有跟上时代步伐,应该为新型基础设施所替代,也就是要加快补齐如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短板,力求做到该建设的建设、该引入的引入、该覆盖的覆盖,进而为农村经济社会数字化、信息化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硬件支撑。正如习近平所指出:“要重点抓好农村交通运输、农田水利、农村饮水、乡村物流、宽带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7]当然,还需特别注意的是,不同地区、不同省份的农村,实际情况会有所不同,如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等农村因地域、气候、人文、地理、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就有较大差异,因而一定要从实际出发来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千万不能一刀切。正是基于此,习近平主要强调了以下三个带有共性的方面。

一是整洁拓宽道路交通。农村道路交通建设,首先是农村脱贫致富的基本要求,也即“要想富,先修路”,这已为农村发展实践所充分证实;其次,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美丽乡村的重要环节,它彻底改变了一些农村“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生活状况;最后,是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的一个重点。“这些年,农村基础设施加快改善,县一级基本都通高速公路了,大多数村庄都通公路了。”^{[8]7}如此一来,农村的道路不仅变多、变长、变宽了,而且变得整洁、漂亮、通畅了。可见,加强道路交通建设是实现生态宜居的关键。

二是设计规划村庄建设。习近平十分重视村庄建设,针对一些村庄“外面像个村,进村不是村”^{[8]8}的现状,习近平指出其暴露出的最为严重的问题就是“村庄建设没规划、没秩序、没特色……有新房没新村,有新村没新貌”^{[8]8-9}。习近平强调,村庄建设的设计规划,包括其中的农房建筑一定要突出地域特点、乡村特色、风土人情等,要与乡村文化相契合,保留乡村风貌和民俗传统,而不能“搞得城市不像城市、农村不像农村”^{[3]50}。这就告诉我们,村庄建设一定要把握其差异性、体现其宜居性,做到因村制宜,从而为农村居民提供一个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三是绿化提升生态环境。乡村生态振兴作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点,其基本要求就是要绿化乡村,而要绿化乡村,就要“推动国土绿化高质量发展,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因地制宜深入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行动,持续推进……森林乡村建设”^[9]。实施乡村绿化,着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加强森林管护,不仅有利于美化乡村景观建设,进而做到四季常绿,还会美化农村生态环境,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农田林网化、村屯园林化、道路林荫化、庭院花果化”^[10]⁵⁴的乡村绿化目标。

可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可以说是从根本上、长远上来治理农村生态环境,以促进美丽乡村建设。

(三)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现实问题。厕所革命、污水治理和垃圾处理一直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抓手,直接关乎农村环境质量、农民健康和生活幸福感。

针对厕所革命,习近平在2014年就指出:“解决好厕所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意义,要因地制宜做好厕所下水道管网建设和农村污水处理,不断提高农民生活质量”^[3]⁸⁹。2017年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像抓‘厕所革命’一样,不断加强各类软硬件建设。”^[5]³⁴¹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以下三点:一是坚持稳步推进。从农村生产生活实际出发,充分考虑地域、气候、居民的生活习惯等因素,因村施策,普及不同标准的厕所,并使厕所改造环节与垃圾污水处理环节有效衔接,进而实现无害化处理,最好做到资源化利用,把治标与治本统一起来。二是加强硬件建设。推进“厕所革命”,各类硬件建设必不可少。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农村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加政府的资金支持力度,不断对厕所破旧设备进行更新换代,不断完善粪污处理体系等。三是加强软件建设。推进“厕所革命”,软件建设尤为重要。它与硬件建设一定要同时抓,既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厚此薄彼。为此,就必须提高农民综合素质,增强村民环保意识,充分认识到“厕所革命”的紧迫性。

针对污水治理,习近平强调了水安全的重要性。他指出:我国水安全已全面亮起红灯,部分地区已出现水危机,“水已经成为了我国严重短缺的产品,成了制约环境质量的主要因素,成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安全问题”^[3]⁵³。为此,一定

要完善农村污水处理体系,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确保农村居民饮用水安全,这是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一项紧迫任务。其次,习近平指出了进行污水处理的实施路径。他强调以下三点最为重要:一是坚持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无论是选择集中处理还是户内处理,都要结合所在村庄距离城镇的远近和人口密度情况进行,不能一刀切,这是进行污水处理的基本原则。二是做到梯次推进、久久为功。农村污水治理模式和技术的选择,一定要立足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走符合农村特点并动员各方面力量积极参与的综合治理路子,这是进行污水处理的具体举措。三是增强农民环保节水意识。习近平提出,可以通过广播、讲座、新媒体等形式,“大力宣传节水和节水观念。树立节约用水就是保护生态、保护水源就是保护家园的意识……倡导节约每一滴水,使爱护水、节约用水成为全社会的良好风尚和自觉行动”^[3]¹¹⁶⁻¹¹⁷。让广大农民充分认识到水对人们生产生活的极端重要性,才能使其确立良好的用水观念,进而消除水龙头上的浪费,同时有效减少污水排放,这也是一个需要加强的标本兼治的好办法。总之,只有加快形成农村污水治理的强大合力,才能确保农村水环境安全。

针对垃圾处理,习近平强调了建立垃圾分类制度的重要性。他指出:“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制度。这项工作关系十三亿多人生活环境改善,关系垃圾能不能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理。”^[3]⁹³为此,一定要想尽办法让村民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这不仅有利于改善生活环境质量、节约使用能源资源,同时也成为“社会文明水平的一个重要体现”^[11]。其次,习近平提出了进行垃圾分类的基本要求,即“要加快建立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的垃圾处理系统……提高垃圾分类制度覆盖范围”^[3]⁹⁴。这是因为,农村垃圾随意丢弃或露天焚烧,很容易造成土壤、水体和空气污染。科学处理垃圾可以降低污染风险。垃圾分类回收有助于将可再生资源(如塑料、金属、厨余垃圾)循环利用,减少资源浪费。

总之,推进厕所革命、治理污水和处理垃圾作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重点,是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实践,因而一定要在“压实县级主体责任”的基础上,“注重实际效果,注重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同当地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绝不能刮风搞运动、做表面文章”^[8]¹¹⁷。厕所革

命、污水治理和垃圾处理共同推进,才能有效减少农村环境污染,实现农村空气、水体和土壤环境的整体改善,为农村居民提供健康、宜居的生活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

结 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25}作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1]23}的五个重要方面之一,必然要求加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生态环境“直接影响米袋子、菜篮子、水缸子、城镇后花园”^{[5]369}。正是基于此,本文以习近平关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论述为理论基础,深入探讨了新时代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策略导向、路径选择和具体实践,认为它们都是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农情出发、立足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实际而又着眼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和未来而提出来的,都是利国利民利长远的,它们都具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价值导向。因此,学习和研究习近平关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论述,对于推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难题、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等,都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2]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4]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N].人民日报,2015-02-02(1).

[5]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6] 李桂花,杨雪.乡村振兴进程中中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探究[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7] 霍小光,等.上下同心再出发[N].人民日报,2019-03-15(1).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9] 习近平:推动国土绿化不断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J].当代广西,2019(8).

[10]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11] 习近平对垃圾分类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培养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为改善生活环境作努力 为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作贡献[J].农村工作通讯,2019(13).

Strategic Orientation, Path Selection, and Specific Practices in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LI Gui-hua, LIANG Qiu-shi

(School of Marxism,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aspect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must have strategic orientations, such as accelerating the formation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promoting the widespread adop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methods, and constructing new production relationships. It also requires path selection, such as clarifying the main forces in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adjusting the layout of r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ing investment in agri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utcomes. Additionally, specific practices are needed, such as enhancing farmers' awareness of their role, improving infrastructure, and enhancing the rural living environment. Only by organically combining these three elements can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in our country reach a new level and achieve more significant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trategic orientation; path selection; specific practices; beautiful countryside

[责任编辑:王 春]